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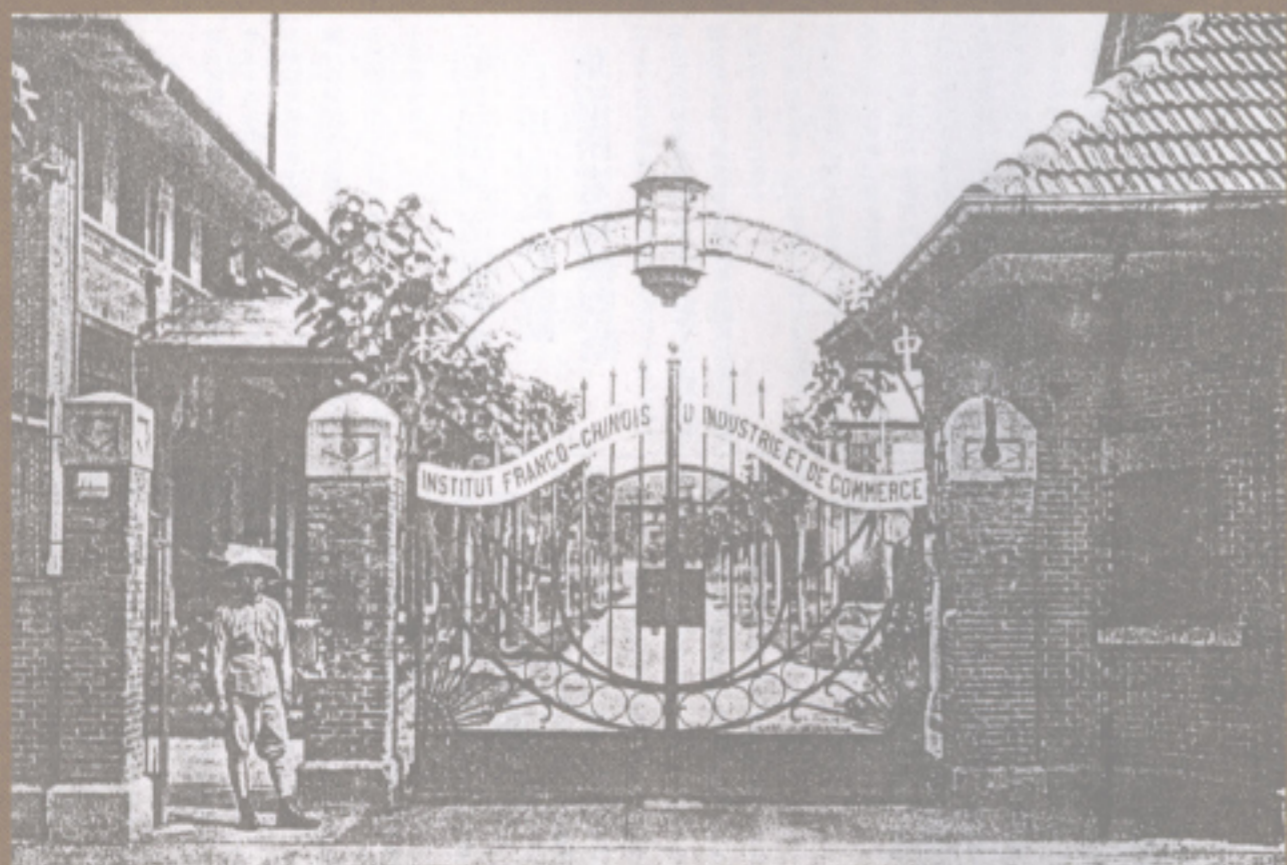
■ 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图书馆 (朱才忠 摄)



法租界里的工科学学校

—— 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百年沧桑

□ 王细荣



■ 中法国立通惠工商学校校门



■ 1914 年落成的工科讲堂

位于黄浦江畔的上海理工大学，其文脉渊源可追溯至1906年创建的沪江大学和1907年创办的德文医学堂。当年的德文医学堂校址位于现上海市文化广场以西的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复兴中路1195号）。

从德文医学堂到理工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在20世纪上叶先后见证了德文医学堂、同济德文医工学堂、中法国立工学院、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等院校的兴衰。

上海德文医学堂由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于1907年6月3日创办。1908年，校名改为“同济德文医学堂”，并在宝昌路（今淮海中路）以南的法华路（后改名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购地12亩，建造新校舍。1909年暑期，新址一些校舍（如德文科讲堂、第一宿舍、钟楼）相继落成，德文科和医预科师生全部搬入新校舍。

1912年6月，学校新办工科学堂，校名也随即更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并紧靠学校旁增购地基，兴建工科新校舍，校园面积达31亩。学堂的构思和布局，以普鲁士皇家机械学校的设计方案为蓝本。经过几年陆续建造，学堂校舍已初具规模。至1917年，共建成德文科讲堂，医预科讲堂，工科讲堂，病理学和卫生学讲堂，X光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宿舍，操场，风雨操室与运动场等，全校面积扩大至51.06亩，范围包括今陕西南路以西、嘉善路以东、复兴中路以南、永嘉路以北地区，地处当时“新法租界”中心。

学堂的校舍极具普鲁士的建筑风格。当年上海的《申报》有一篇关于这些建筑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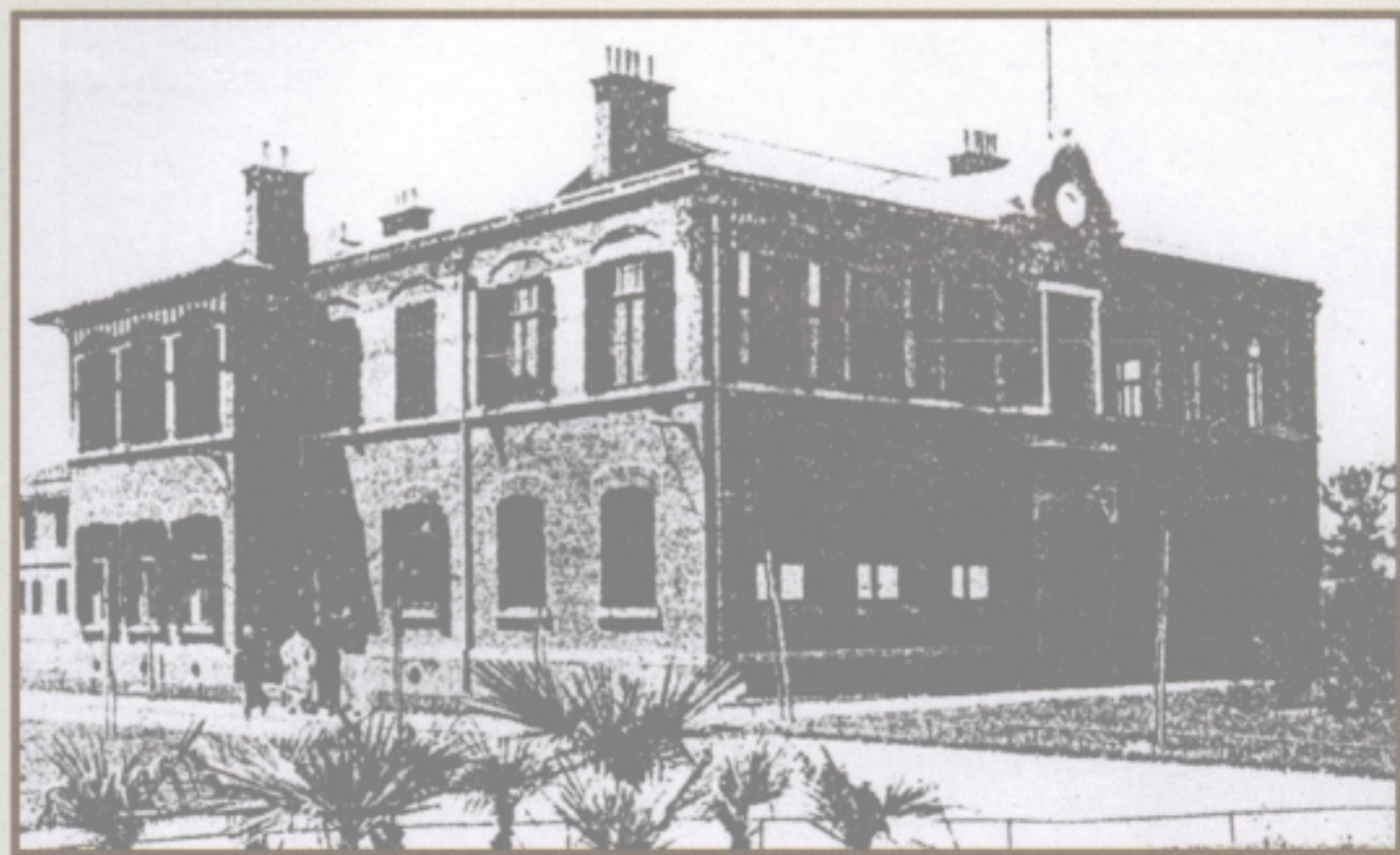
步入校园，首先看到的是工学堂雄伟的教学大楼，在教学楼对面是机电楼，楼内设有各种实验室、电机房、学徒实习车间、铸造车间、锻工场和木工房。走过位于校门两侧的教学楼与机电楼，便是设有教师阅览室的德文科和两座在同济德文医学堂创办初期盖的学生宿舍。在整个建筑群中间是一幢造型典雅的建筑，其两边分别写着“生理学”、“解剖学”的字样。在这约3万平方米的校区南端，坐落着宽敞的健身房和在所有建筑中规模最大的新宿舍楼，这幢宿舍楼可容纳200名学生。新造的楼房均为砖块砌筑的清水墙面，其周围是绿色的草坪。



■ 1909年建成的钟楼

在这些建筑群中，最具特色的是工科讲堂。建筑设计图纸是由德国建筑师卡尔·培台克绘制，模型由工厂监督制定，构架完全仿自普鲁士皇家机械学校。1914年落成并开始启用。1995年12月出版的《德国杂志》上有一篇题为《建筑，德国在中国的明显影响》，文中将这幢大楼作为在中国的普鲁士建筑风格的标志。此大楼虽年已近百，但结构完好，其砖木结构、走廊的马赛克地坪，至今完整如新。这幢大楼是上海近代的优秀建筑，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于1909年建成的同济德文医学堂的德文科讲堂，也是一座普鲁士风格的经典建筑。中法国立工学院时期为法国院长住宅，解放后曾作为学校办公楼。



■ 1909年建成的德文科讲堂

另一处别具风格的建筑为1909年建成的钟楼。她象征学校的精神——时不待人。

1917年3月17日，上海法租界当局借口“中德邦交已绝”，以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属德国产业、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机械制造武器为由，迫令学校解散。至1919年6月，位于法租界的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校舍一直被安南兵占领。

1921年3月10日，中法两国共办的上海中法国立通惠工商学校在原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旧址上开学。学校设土木工程科、机械电气科、商科，远近学子负笈前来，学生人数达400余人。

1923年，国民革命运动兴起，校务一度停顿。同年，停办商科，校名更为“上海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1929年，奉当时的教育部令，上海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更名为“中法国立工业专科学校”。1931年，因年数及课程与教育部新颁布的章程相抵触，学校报请教育部，拟改为独立学院。1931年10月21日，奉教育部照准令，校名改为“中法国立工学院”，仍为中法两国政府共同领导，两国各派一名院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巴黎沦陷，维希政府投降纳粹，无心办学。1939年11月24日，法国大使戈思默致函法租界教育处长高博爱，决定停办中法国立工学院。1940年秋，中法国立工学院停办。1940年冬，由中法两国政府派出人员组成“中法国立工学院院产保管委员会”，负责保管学校财产。从此时起至1942年，中法国立工学院校舍成了侵略者的军营。

1943年，原中法国立工学院的师生成立“校友会复校运动委员会”，利用中法国

立工学院部分校舍创办了“私立中法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中法高工”），原中法国立工学院数学教师林治平（又名林祖欢）任校长。1945年初，校长林治平病逝，由原工学院校友陈廷骧继任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曾有中法国立工学院复校的打算。但由于原有学生均于抗日期间转入后方各大学，故复校计划流产。1946年8月23日，鉴于中法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机械、电机、土木3个班的学生仍在学校学习，国民政府教育部奉行政院令，在上海接收前中法国立工学院校舍及设备，并将重庆鸡公塘的“国立高级机器职业学校”迁沪与中法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合并，成立“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简称“国立高机”），任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夏述虞为校长。私立中法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停办，学生并入国立高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代表李正文接管国立高机，并接收在原中法国立工学院校址内的私立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校舍（现中德学院办公楼）。7月29日，陈毅、粟裕签发命令（文高教字第8号）接收国立高机，并于当日举行国立高机印章移交仪式。

1950年6月1日，学校改由华东工业部领导。1950年12月4日，华东工业部通知学校改名为“华东工业部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之后校名又先后改为“上海第一机器制造工业学校”、“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上海动力机械专科学校”、“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机器制造学校”、“上海机器制造学校”、“上海机



■ 何尚平老师

械专科学校”。1993年6月2日更名为“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1996年5月，与华东工业大学（原上海机械学院）合并，组建上海理工大学，成为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

支持中国抗战的伯努瓦

伯努瓦先生是中法国立工学院大学部的法语老师，同时还在震旦大学兼课，曾为化学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过举世闻名的法国沙姆（Somme）大战。这次大战，英法联军打退德军进攻，保住法国防线直到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课余，他常讲述他的参战经历，令学生们钦佩不已。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伯努瓦

先生是当时上海法租界法国义勇队队长，中法国立工学院土木系法国教授卫葆贲（Viborel）先生是该义勇队队员。他们都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十分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千方百计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八一三”淞沪抗战，我国军民在上海奋勇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达3个月之久，得到上海法国居留民的同情和支持。留在法租界内的中国伤兵被协助转移到了后方，其中也有不少高级将领，都曾在今太原路一所法国人的高级医院中接受过治疗。他们都是在1938年后由法国邮船转移到九龙，再乘飞机到后方的。

1937年11月10日，中国军队后撤，伯努瓦率领法国义勇队和一队安南兵，驻守在今枫林桥的中国科学院。掩护南市、浦东中国军队撤退的殿后部队约1500人到达枫林桥、徐家汇一带。中法国立工学院马本初同学参加当时南市战地服务队，他随队伍也退到该地的铁丝网外面。因为他认识伯努瓦老师，便向他打招呼，伯努瓦见到了就命令安南兵移开铁丝网，让他和伤兵一同进入租界受到庇护。

1939年7月，毕业班离校时，宴请学校领导及有关教授。当时除法国院长薛藩正患伤寒未到外，出席的有代院长农汝惠、潘颖昌、刘宝信、江之永、杨智钟等中国老师，以及伯努瓦、卫葆贲两位法国老师。席间，伯努瓦老师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道：

“你们已经毕业了，我向你们热烈祝贺！我们大家能有机会相处多年，是很难得的。你们的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我们深表同情。你们将以所学到的知识为你们的国家出力，担负起保卫你们国家的重任。”

大家听了都十分感动。后来他还在自己的寓所设茶点招待毕业班全体同学，师生谈得十分融洽。席间，他还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但法国政府一味妥协，使德国侵略者得寸进尺，他为祖国担心，因此他特别敬佩和同情我国的抗日斗争。

制水雷炸敌舰的何尚平

中法国立工学院的化学老师何尚平是福建闽侯人，复旦大学毕业，后赴比利时留学。回国后从事蚕丝制造业研究和蚕桑业的改进工作，为中国古老的蚕桑丝绸工业的复兴、改良和发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卓越贡献。解放前，他曾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国驻巴黎



■ 1937年8月，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海军旗舰“出云号”

总领事、里昂中法大学校长等职。

受中法国立工学院法国院长薛藩的邀请,何先生担任了高中部化学讲师。每星期四个下午来校授课,历时十余年。何尚平老师推行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深受同学们的崇敬和爱戴。何老师曾帮助爱国实业家吴蕴初在上海建立天原电化厂、天利氮气厂和天厨味精厂,为振兴我国基础化学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还亲自带领学生到上述工厂去参观学习,并现场讲解。

在上海,何先生还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上海社友会(或称“上海分社”)的秘书和理事等职。抗战期间,他曾负责保存过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如今头盖骨的下落已成世界之谜。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寇大举进犯上海。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巡洋舰就停泊在外白渡桥东北堍的黄浦江面上。何尚平与几位爱国科学家秘密集会商议,由何先生在中法国立工学院南面一所平房内,动手制造烈性炸药三硝基甲苯,然后用土法装配成一枚水雷。同时,上海地方协会的杜月笙募得敢死队员1名。在一只小舢板引路下,这名敢死队员怀抱水雷,从浦东泅水游向“出云号”巡洋舰,准备炸沉该舰。不料舢板船摇近敌舰时,被舰上日军发现,当即鸣枪警告。舢板仓猝发出信号,掉头离去。浦东接应人员立即引爆水雷。一声巨响,波浪冲天。虽未能炸沉敌舰,但舰身剧烈晃动,已使日寇惊慌失措,一片混乱。这时,何尚平、宋子文、杜月笙以及应邀而来的若干新闻记者,已聚在外滩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的酒楼东庭观看炸舰,准备庆功,发表新闻。结果炸舰未成,敢死队员殉国,众人在惋惜声中相继离去。然而,这次炸舰行动,无疑是给了日寇一个严正警告:中国到处有仁人志士,不可轻侮。

1939年春天,上海租界当局屈从侵华日寇,无理规定一年内只准悬挂国旗8天(或10天)。有一纪念日,不在规定日期以内,何先生所在的中国科学社内升起了中国国旗。一个法国巡捕前去干涉,遭到何先生严辞训斥,坚持升旗。

1939年下半年,何先生去昆明开拓蚕桑事业,抗战胜利后仍回沪主持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工作。解放后,任中国蚕丝公司蚕丝研究所(后改为华东农林部丝绸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政协上海市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社长。1970



■ 夏述虞校长

年12月25日,何先生在上海病逝。

一生与“勤工俭学”紧紧相连的 夏述虞校长

夏述虞,原名夏舜卿,化名夏孚云,1896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安新县圈头乡桥东村(原属任丘县)。

1919年3月17日,夏述虞从上海乘船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先做了几年工,省吃俭用,攒了一些钱,于1925年考入法国阿尔捷梅杰工业学校学习。1928年学成回国,在上海汽车学校任教员。1929年,他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参加了老西北军,在一次战斗中被杨虎城的军队俘虏了。由于夏述虞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平时为人正派,不贪财,杨虎城正当用人之际,便亲

自找他谈话,并委以重任。1929年,他赴西北任兰州汽车修理厂厂长、陕甘汽车管理局局长、机务主任,1930年任西安17路军汽车修理厂厂长,1933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交通处处长,1936年任西安交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当时西安的交通运输。1936年12月,参加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述虞用杨虎城出国考察前给他的5万元钱,于1937年夏天创办了私立陕西省西安高级职业学校,自任校长。学校办起不久,因日本飞机经常到西安狂轰滥炸,学校便迁到离西安市500华里、位于秦岭山区的小镇双十铺。夏述虞根据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验,在学校推行半天读书、半天做工的半工半读制度,并且按照法国阿尔捷梅杰技术学校的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因而学校的教学质量提高得很快,不久就远近闻名了。

夏述虞任西安高级职业学校校长期间,曾经帮助一些学生去了延安。其中一位得到夏校长帮助过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级干部,并曾多次到上海寻找过夏校长,但均未果。离休后,他愈发思念昔日的校长,便于1997年前后派人专程来沪,希望通过上海理工大学寻找夏校长及其家属,以谢昔日之师恩。

1946年8月,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夏述虞调入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任校长。由于战乱,这所学校当时已是一个烂摊子。接管后,夏校长一方面通过上海在敌产局工作的侯昌国,花了不多的钱买了不少日本旧机器,以增添学校实习工厂



■ 国立高机的学生参加军训

的设备，一方面设法聘请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教授来校任教，如请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容普到校教代数，请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林海明到校教电机……夏校长根据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心得体会和在双十铺办校的经验，在教学管理上力推“工学结合”的方针，严谨治校，对学生实行军营式管理，学校很快改变了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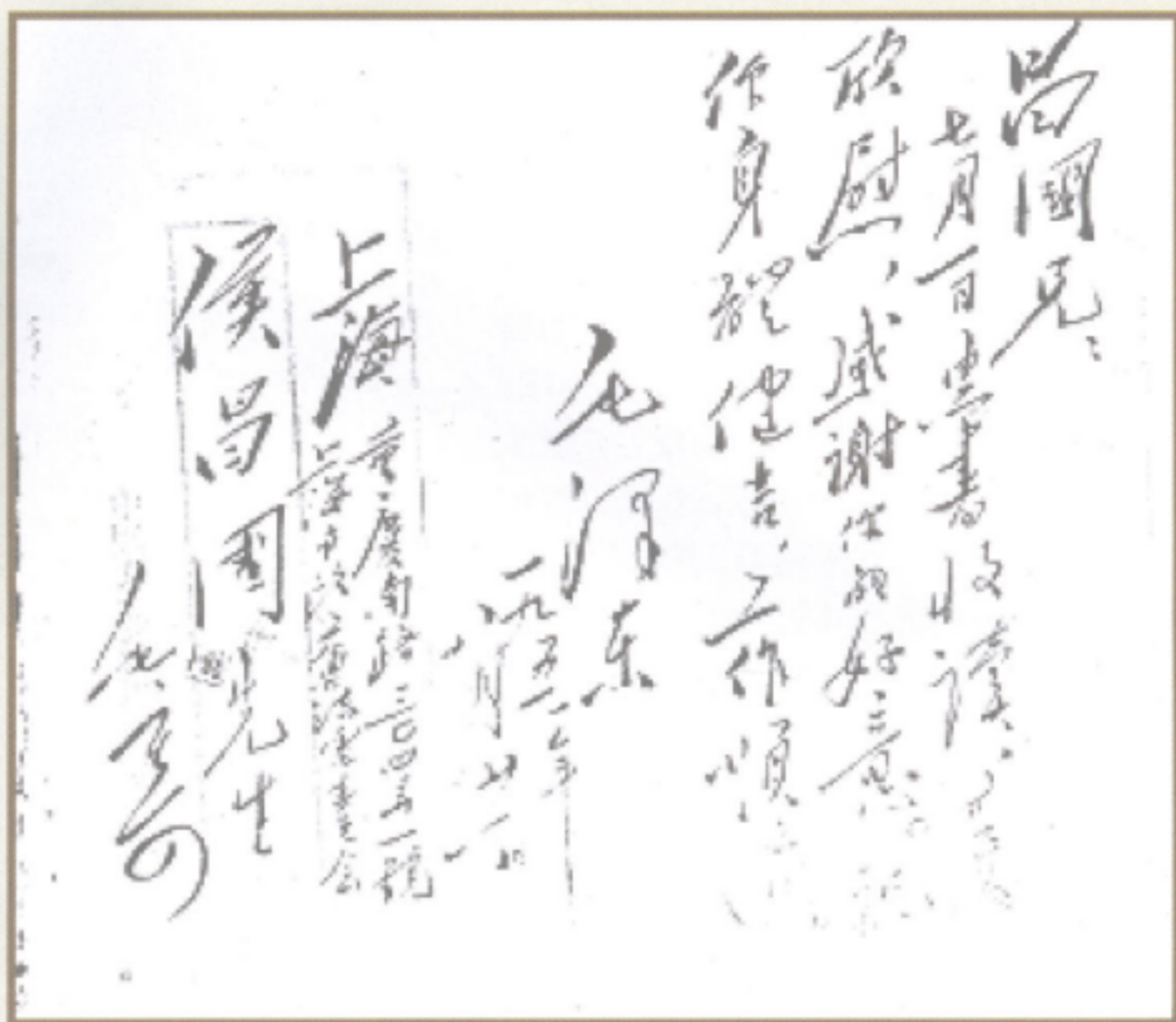
夏先生虽然身为国民政府主办的国立高机校长，却一直未加入国民党，他对当局的倒行逆施非常厌恶。他十分关心学校师生的安危。国立高机第一届毕业生、后留校任教的吕国钧，因与校外的进步人士有联系，被国民党特务怀疑上了。夏述虞校长便通知学校其他年轻教师赶在特务之前去清理他的宿舍（虽然在宿舍里没有发现什么，但在楼梯间发现了一些进步书刊），巧妙地保护了吕国钧。另外，他发现一些学生地下党员有“不对劲”的苗头时，即以“操行列入戊等”等理由让他们退学，使他们免遭校内“三青团”等反动势力的迫害。

1951年1月，夏述虞被调到上海法商水电交通公司担任工程师，1958年5月在上海退休。1981年3月29日逝世，终年85岁。他曾经深情地说道：“回忆我的一生，无论是求学或办学，都与‘勤工俭学’这四个字紧紧相连。”

终生不忘祖国的 侯昌国教导长

侯昌国，字楚善，1898年4月生，湖南湘潭县太湖乡永丰村（现属株洲

■ 毛泽东主席给侯昌国的亲笔信



县)人。1917年与毛泽东同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在毛泽东、蔡和森等带动下，积极投入五四运动。1920年，与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李维汉等革命前辈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参加了“工学世界社”活动。1929年学成回国后，以工业救国为己任，曾任总工程师、教授等职务。1946年，上海“国立高机”成立，他应邀担任了教导长职务，为国立高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据国立高机的校友盛庆梁先生回忆，侯教导长为学校课程的设置、工厂机器的修缮与添置付出了很多心血。特别是在临近解放时，学校经费极端短缺，粮食供应紧张，他便利利用自己在中央信托局兼职的便利条件，为学校争取了不少的办学经费，很多都是外汇，调拨来大批粮食（有时连学校走廊都临时用于堆放粮食），保证了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侯教导长也很关心学生。有的学生在寝室里收听解放区电台节目，他没有制止，只是叮嘱他们声音尽量低一点，以免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到什么把柄。国民党军队曾一度企图占领学校，他便与其他校领导和教职工一道，极力反对，据理力争，终于使校园未能成为反动

军队的兵营。

解放后，侯昌国的技术专长得到充分发挥。1950年，任华东电业局工程师。是年2月6日上午，上海遭遇了“二六”大轰炸，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军出动17架飞机，分四批轮番对上海市区狂轰滥炸，炸死炸伤1400人，炸毁房屋2000余间，杨树浦发电厂、闸北自来水厂毁坏严重，上海的电力丧失90%，全市陷入一片黑暗，市区工厂几乎全面瘫痪。就在此时，侯昌国奉命带人赶赴杨树浦发电厂，参加检修被毁坏的发电设备，使上海很快恢复了光明。

1951年，侯昌国任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会副主席。1952年，被评为上海市一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并出席全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毛主席单独接见了她，并设家宴欢聚，重叙昔日友情。1953年，任上海供电分区主任兼线路管理所工程师。1958年，任上海业余动力学院教务科长。反右运动中，侯昌国先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后在中央有关领导关心下得到彻底平反。“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家隔离审查，因抄到毛主席给他的亲笔信才免遭迫害。尽管受到如此大的冲击，但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文革”后，在国外的子女想接父亲出国，他意味深长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要忘记祖国，我不愿离开我的故乡。”

1981年2月14日，侯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3岁。中央领导蔡畅、李维汉同志均致电悼念。国立高机第一、第二、第三届在沪学生30多人参加了恩师的追悼会。◇



■ 国立高机学生在工厂实习时与管理层合影

我年轻时兴趣爱好极广泛，听评弹、看滑稽、打弹子、跳交谊舞等等。这些都先后在《上海滩》上谈过了。其实，我还有一项终身痴迷的爱好——踢足球。

在抗战胜利后至上海解放前的这段时间，我几乎每天到闸北区新疆路、国庆路的扬子球场踢小型足球。所谓“小型足球”，即以七人为一队，场地约为标准球场的一半。那时，民间足球赛常用这种赛制，并一直流行到解放后，80年代足球名宿张邦纶还热衷于踢小型足球。当时这球场纯是营业性的，是由扬子大楼（大楼内有个名闻遐迩的扬子舞厅）老板建造的。

通常每天上午有三支球队在此踢球：我所在的申北队、另外一支球队以及滑稽界组成的小型足球队。这三支球队中论名气当然是滑稽界的球队，因为他们下午起便有演出任务，故只有上午可踢球。该队的负责人是潮流滑稽刘春山的开山门大弟子筱春山。领队是杨笑峰，主力队员是著名演员袁一灵。

袁一灵从小就喜爱足球，早年在南市体育场踢球时就加入了全黑队，在滑稽界中，就数他的球艺最高了。由于袁上午几乎都沉醉于球场，下午的演出节目又排得满满的，这样未免冷落了妻子，因此他时常将妻子带至球场。其妻与袁都是苏州人。由于来球场次数多了，其妻也渐渐喜欢上了足球，不仅懂得比赛规则，而且与各队的球员都熟识了。

在此练球的这三支球队，每天各队都包上一小时，这样一个上午共有三小时可供踢球。其间如无比赛，三支球队就在一起练球。如此者已有多年，三支球队的成员间都混得很熟了。当上午练球结束，我们便一起到球场对面的一家茶馆小憩，洗脸、喝茶并聊天。有一次兴致上来了，我和筱春山队里一名绰号“肚通海”的队员打赌，看谁能够一口气吃下四碗阳春面。结果，“肚通海”吃到第四碗就不敢下筷了，只好认输。

别看我仅是一名普通的足球爱好者，生平也曾多次与社会名流赛过足球。最有意思的一次是与王少楼等京剧演员的比赛。不过，那次比赛的地点不在上海，而是在南京。

原来，我队有个叫冯培声的，是京沪特快列车上的司炉工。有一次，他邀请我及队友的韦植业、金林生三人同作南京游，并言明食宿均由他负责。盛情难却，我们接受了冯的邀请，来回都乘坐冯当班的列车。

我一到南京，就去看望在此演出的滑

■ 老上海的足球比赛



我与王少楼赛足球

□ 俞志平口述 郑贯源整理

稽演员、我的芳邻筱春山。他见我们四人都 是小型足球的痴迷者，便 有他乡逢故知之快。后来在他的建议下，我们四人加上筱春山和他的独脚戏搭档徐天麟，又在他团内选上一位，凑满七人组成一队，与京剧队进行了一场球赛。

对手是南京市小型足球赛的冠军——明星队。当时这个京剧团正在南京明星大戏院演出，故名。明星队的队长就是著名武生王少楼。王少楼有“江南一条腿”之美誉，其腿能伸直独立数分钟，坚硬如铁而不弯曲。王出道早，13岁即登台，曾演连台本戏《水泊梁山》达23本之多，自任团长后又编演《西游记》、《开天辟地》、《忠王李秀成》等，深受上海观众的喜爱。

明星队中的球员都是其剧团中的武戏演员，如王少楼的“下把”胡少奎、张银邦、王少鹏等。所谓“下把”，是指为武生配戏的副角。如王少楼在演出他的名剧《十八罗汉收大鹏》时，胡少奎和张银邦就分别扮演“降龙”、“伏虎”两罗汉。

当时两队借了一个球场进行比赛。球迷和观众蜂拥而至，他们主要是冲着王少楼和筱春山而来的，因他们两人在南京均是红极一时的名角。

比赛开始，王少楼担任明星队的守门

员。这位在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此刻依然仗着一身武功，把守球门，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气势。但球赛毕竟凭球艺，不是靠武艺，上半场开始不久，我觑准机会，飞起一脚，那球避开王少楼的铁腿，越过其头顶，直捣黄龙。这下明星队的武生球员就控制不了情绪了。因为他们是南京的冠军，倘若成为我们这支杂牌军的手下败将的话，将颜面何存！于是也不讲什么球艺了，他们将舞台上的翻、滚、扑、打等一套武戏动作全部用上。当他们抢球而受我方阻挡时，或施展武功明抢，或暗暗发力于我方队员的穴位处，使我方队员腿脚失灵；而待我方争球时，对方竟有人使出了武戏的程式“硬僵尸”来装死——我方队员尚未触及其人，却见他大叫一声，突然向后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佯装不省人事状。裁判员当然判我方严重犯规，并吃罚球。这样一来，我队士气大受影响。

赛间休息时，我对筱春山说：“我们就输给他们算了，要不然，我们这些人恐怕不能双腿完好地回到上海了。”筱春山也无计可施，只好同意。最后我队以1比2负于明星队，但我们并没有垂头丧气，因为在这场独特的比赛中，没被踢得断胳膊瘸腿就算幸运了。◇